

平衡婚检的隐私权与知情权

——取消强制婚检后提倡自愿婚检

曲青 厦门大学法学院民商法硕士研究生 518055

2003 年 10 月 1 日,新《婚姻登记条例》以自愿婚检代替强制婚检后,宛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赞誉者有之,批评之声亦不绝于耳。有些准夫妻认为,这下再无须面对婚检医生那板着的面孔,回答诸如“你是否是处女”、“有没有流过产”等尴尬问题,也无须将祖宗八代的私密病史写到体检报告上。也有些人认为,这只不过省却了结婚过程中一个较为繁琐的手续罢了,不值得有那么大的反应。但有人却认为,取消强制婚检,是对结婚对象的不负责,是对整个社会的不负责。如果真的患有不宜结婚的疾病,而其又不欲告知,与之结合之人岂不身受其累,不单只如此,如再哺育出一个不合格的第二代,则给个人、家庭及社会都带来负面的影响。种种言论,莫衷一是。

中国的强制婚检源于 1986 年卫生部和民政部共同下发的《关于婚前健康检查问题的通知》,1994 年颁布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首次把婚检制度写入法规。1995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以立法的形式明确了婚检制度。

对于有人的担心,如一方确患有传染性的疾病,而其又不告知,与其结婚岂不是遗憾终身?《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七条明确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禁止结婚:(二)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新《婚姻登记条例》也明确规定“双方知情、双方愿意、采取必要预防措施”情况下结婚。

其实,对取消强制婚检的欢迎多来源于对隐私权的保护。面对社会上的众多评论,笔者认为,中国的新《婚姻登记条例》虽然取消了强制婚检,但仍需提倡自愿婚检,以取得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平衡,保护结婚双方当事人的知情权。如一方确患有传染病而不告知,其则侵犯了另一方的知情权;而如果做出婚检的医生不告知,则同样侵犯了知情权。我们有必要通过对隐私权与知情权的探析,来寻求两者之间的平衡。

隐私作为一种法律概念及权利,是指与他人无关的私人事务及私人信息。学界对隐私的分类有两分法及三分法。两分法即将隐私分为静态隐私和动态隐私。静态隐私是指有形的,包括动产和不动产;动态隐私则指属于私人生活范围的私人事务、私人关系以及与他人生活密切相关的私人信息,而私人信息既包括与每个人的自身紧密相连的信息,也包括一些属于非人身性质的数据信息。三分法则将隐私分为:一是个人信息,为无形隐私;二是个人私事,为动态的隐私;三是个人领域,为有形的隐私。在此种分类中,个人隐私具有层次性,即个人信息居于核心层次,个人私事次之,个人领域则处于外层。婚检恰恰触及的是个人隐私中的核心层次。依据隐私客观真实性及隐蔽性的特点,取消婚检是势在必行的。隐私权的概念是美国法的产

物,最初由美国学者沃伦和布兰代斯 1890 年在刊登于《哈佛法学评论》上的《论隐私权》一文中提出(Warren & Brandeis, The Right of Privacy)。隐私权是人格权分化过程中“新生的”的一种人格权,是指公民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等的人格权。

联合国大会 1948 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二条规定:“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攻击。”1996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7 条也规定“刑事审判应该公开进行,但为了保护个人隐私,可以不公开审判。”

中国《宪法》第二章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其中第三十八条、四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民法通则》第五章(民事权利)第四节(人身权)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中国民法典侵权行为编草案建议稿》第 28 条(4)就将隐私权作为一项单独的人格权予以保护,并考虑到中国已有专门保护名誉权、姓名权、肖像权的制度,将隐私权的范围限定在两个方面,即私生活秘密和私生活安宁。

知情权(the right to know),亦称“知的权利”或“了解权”,是指法律关系上的主体有权知道他应当知道的事情的权利。此概念由美国记者 Kent Copper 率先使用并逐步上升为一项宪法和行政法上的权利。知情权包括知政权、社会知情权、个人信息知情权、法定知情权等,其中既包括公法方面的事务,如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政府官员的道德品质及财产状况等也包括民事方面的情况。中国有关知情权的宪法依据,可以从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的法律条文中引申出来。其他一些法律也不同程度的反映了公众知情权的内容,如行政诉讼法中被告的举证责任及公开审理;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公开原则”、“告知制度”及“听证制度”等;行政许可法的第三十二条,进一步规定了行政机关的告知义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

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等。

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私的权利与公的权利之间的矛盾,因此在处理上必须遵循公法优先和公共利益原则。这与恩格斯曾提出的一个原则有相似之处,即个人隐私一般应保护,但当个人隐私甚至隐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的私事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事,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受隐私权的保护而应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民法上的公共利益包括几种类型,第一是不特定第三人的利益,这是公共利益的主要部分,因为不特定第三人是我们大多数人;第二是与基本的法律价值相联系的利益,如生命健康利益等;第三是死者的利益,已经去世的民事主体的利益也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一部分。

在现今的信息社会,人们一方面想尽可能地知悉,另一方面又最大化地保护自己的隐私。但即使一般公民的个人隐私在一定条件下尤其在涉及公共利益时也受到限制,如法院可以在网上公告欠债的“老赖”名单,公民个人的信用状况可供公众查询等。取消强制婚检后,如结婚一方当事人患有不可结婚的传染病,其对另一方结婚当事人不欲告知,另一方当事人的知情权则受到侵害,不单止另一方本人的生命健康利益受到侵害,其下一代的生命健康利益亦无法保障,甚而对整个社会产生负面影响。尽管患病一方享有的隐私权同样不可忽视,但亦不可伤害即将与之缔结婚姻关系的另一方当事人的知情权。保护一方的隐私绝不可以牺牲另一方的知情权为代价。宪法第 51 条规定,公民在行使自己的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他人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法律既要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又要保护公民的其他权利。于是发生了一定的冲突和矛盾。立法和司法在确立公民的隐私权和公民的知情权等其他权利为平等权利的同时,还必须在作为公民个人利益的隐私权和作为他人、社会群体的其他利益之间进行权衡,以确定在具体情况下的优先和让步原则,即根据法律资源利益最大化原则,正所谓“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也即是有一个价值取舍的问题存在。此时社会道德标准即社会公德及社会的公共利益、公序良俗应当成为两权权衡的标准。

纵观世界其他国家,大部分取消强制婚检而提倡自愿婚检。我国取消强制婚检,也是社会及立法的一大进步,但同时还应倡导自愿婚检,以便更好地平衡拟结婚双方当事人的隐私权及知情权。